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建安七子集

俞绍初 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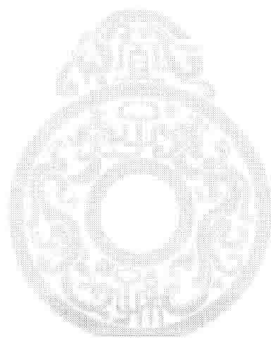
中 华 书 局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建安七子集

俞绍初 辑校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七子集/俞绍初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7.7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2539-9

I.建… II.俞… III.中国文学-古典文学-作品综合集-三国时代 IV.I2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788号

书 名 建安七子集
辑 校 者 俞绍初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马 婧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7月北京第1版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 $\frac{1}{2}$ 插页2 字数358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539-9
定 价 35.00元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餘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

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前 言

建安时期，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作繁荣、成就突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除“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外，当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世称“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生活年代，从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孔融出生，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徐干最后去世，前后共六十余年，正处于汉末社会动乱的时期。东汉王朝自桓帝时起，宦官和外戚互相倾轧，轮流把持政权，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加以他们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掠夺，激起了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的黄巾大起义。这次起义虽在地主阶级联合武装力量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但东汉王朝也因此而一蹶不振，气息奄奄了。随之而出现的便是持续近二十年的军阀大混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军阀混战中，曹操表现了出色的才干。他于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了朝政，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又“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举凡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终于削平了大小军阀的割据，统一了北方，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一〇）与刘备、孙权各据一方，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七子出

身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建安元年以后又相继从各地投奔曹操,成了他手下的著名文士。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儒家思想失去了支配地位,渐趋衰微,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由于曹氏父子对文学的喜爱和倡导,吸引了大量文士聚集于周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因此,在曹操统治的地区内文学取代了传统的经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锺嵘《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盛况。在为数众多的作家中,七子表现得十分活跃,也最引起时人的瞩目。他们除孔融一人外,都是曹操所支持的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常与曹氏兄弟诗赋酬酢,迭相唱和,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建安文学繁荣局面的形成,主要是他们与曹氏父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七子中,孔融的情况与其馀六人颇有不同,他不是曹氏父子的僚属,也未及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孔融(公元一五三—二〇八)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县)人,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轻时以“逸才宏博”而名震远近,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先后为司徒杨赐和大将军何进所辟。董卓专政时,以忤卓旨出为北海太守。及至建安元年,因与曹操“有旧”(见通鉴卷六二汉纪五四),被征召入许,任将作大匠,后迁少府。建安十三年,拜太中大夫,被曹操借故杀害,死时五十六岁。综观孔融的一生,在政治上缺乏远见,无所建树。他恪守儒家的所谓“君臣大义”,抱着“济危靖难”的雄心,企图挽社稷于将倾,竭力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正因为如此,他在建安之初把曹操看作“勤王将领”而表示衷心拥戴,但到晚年一旦发现曹操“雄诈渐著”,便“数不能堪”(后汉书本传),事事加以反对,从而造成一生的悲剧。孔融为人傲诞任性,不拘小节,是汉末清议之士向魏

晋名士转变的代表人物。他又具有不畏权势、爱才敬贤的品质，这正是他常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敬仰之处。

孔融是七子中唯一没有赋作传世的作家。他今存诗七首，其中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不过是“以文字示其巧”（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的文字游戏，严格来说不能算文学作品。杂诗二首，或感慨身世，或悼念亡子，都写得慷慨激昂，凄楚动人，在建安诗作中也堪称上乘，但真伪莫辨。六言诗三首，在艺术上无甚可取，不过诗中反映了汉末的现实，以及孔融初入许时对曹操的态度，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临终诗则是绝命之笔，痛叙自己忠而见谗，情辞愤切。总的说来，孔融的诗歌成就不高，胡应麟诗薮说：“北海不长于诗。”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孔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他在北海时写给僚属的教令，被史书称为“辞气温雅，可玩而诵”（魏志崔琰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看来是深受当时欣赏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教令来看，大多以礼贤爱士为其内容，显得高雅隽永，确实别具一格。如缮治郑公宅教、教高密令等都寥寥数语，便把那种渴慕贤才、急人所难的心情表露无遗，令人想见其气度风采。一些与友人的书信，也写得典丽温婉而又富有情趣，字里行间洋溢着热烈诚挚的感情，同教令一样可以见出他为人“宽容少忌”、坦率可亲的一面。在孔融的散文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那些带有论辩性的文章，如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难曹公禁酒书、汝颖优劣论等。这类文章，无论是陈述己见，还是驳难论敌，都感情充沛，锋芒毕露，令人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气势流贯其间，大有不可阻遏之感。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文心雕龙风骨篇说：“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才略篇又说：“孔融气盛于为笔。”都说明了这些文章的风格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与孔融高迈刚

毅的性格密切有关，此外在语言上骈散结合，排比句式的反复运用，因而取得音情顿挫，劲挺有力的效果，也是重要的因素。曹丕在肯定孔融文章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这确实是孔融某些论说文的弱点。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曾举出他的孝廉论，说“但谈嘲戏”、“言不持正”就是一例。再如难曹公禁酒书，文中把酒的功用夸说到无所不及的程度，而且其所举的事例又多是不根之谈，就难免给人有持论不够严谨，近乎戏谑的感觉。尽管如此，他的散文感情浓烈，文字典雅流畅，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与东汉那些平板呆滞的散文相比，显得生气勃勃，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七子中以散文著称的还有陈琳和阮瑀。陈琳（公元一五五？—一二一七）字孔璋，广陵射阳（在今江苏宝应县东）人。他知名颇早，中平年间为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被杀后，他便避难冀州，在袁绍手下任职。建安十年，袁氏败亡，他才归降曹操。阮瑀（公元一五九？—一二一二）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年轻时受学于著名学者蔡邕，深得其赏识。建安初年，他为曹操所招，任司空军谋祭酒，后与陈琳共掌记室，当时曹操的军国文书，大多出自他俩的手笔。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亡，陈琳则在建安二十二年与刘桢、应场同得疫病而死。

陈琳、阮瑀二人的章表书檄闻名当时，典论论文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琳、瑀以符檄擅声。”但他们的章表之作已悉数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是数篇书檄，其中以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以及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最有影响。这些文章引古论今，陈说利害，都写得洋洋洒洒，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尤其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历数曹操的罪恶，夸说袁绍的军威，酣畅淋漓，一气呵成，是广泛传诵的名

作。比较而言，陈琳的文章更多地接受了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善于铺张，气势奔放，但有时也存在着说事过当、语辞繁冗的缺点；阮瑀的文章则得力于蔡邕，显得稳健沉着，然其才情笔力似不及陈琳。他们二人都好用典隶事，讲究对偶辞藻，文章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骈化的迹象。

在诗歌方面，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借用乐府旧题来揭露社会问题的篇什，十分引人注目。饮马长城窟行写封建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劳役，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这在战争频繁、世道离乱的建安时期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在形式上，此诗成功地运用对话揭示劳役制度的罪恶，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思新奇，别具匠心，即使放在汉乐府中也并不逊色。驾出北郭门行描述孤儿受继母虐待的悲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汉乐府中的孤儿行。此外，他们二人还写了一些抒情诗。如阮瑀的七哀诗、怨诗等抒发羁旅飘零、人生无常的感慨，较多地接受了古诗十九首消极方面的影响，情调不免过于伤感衰颓，但多少可以看出当时动乱现实所造成的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在这方面陈琳的人生态度要比阮瑀积极向上，如其游览诗之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在慨叹人生易过的同时，热切希望及时建功立业，这种思想情绪在建安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徐干、刘桢、应玚三人年岁比较接近，都曾当过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徐干（公元一七一一—二一八）字伟长，北海剧（在今山东寿光县）人。他年轻时就博览群书，“言则成章，操翰成文”（中论序），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董卓乱起，便隐居不仕，以读书自娱。约在建安十三年前不久，应曹操之命，出任司空军谋祭酒，历五官

将文学、临菑侯文学，于建安二十三年病亡。徐干为人淡泊少欲，晚年更托病居家，一心从事著述，有中论二十余篇传世。

徐干的辞赋曾得到曹丕的推崇，认为可与王粲匹敌，而上追张（衡）、蔡（邕）（见典论论文），但流传至今的仅有数篇经过后人删节的残文，已无法窥见其全貌。又据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徐干以赋论标美”，可知他的论说文与辞赋同样是受前人重视的。从曹丕答吴质书极赞徐干之中论推测，刘勰所说的“论”，可能是指中论。其实中论是一部“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曾巩中论目录序）的学术著作，并非文学作品。徐干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特色，且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是其诗歌。他今存诗四首，以叙闺情为主要内容。如室思诗描写女子对所爱之人的思念，表现她期望对方回到自己身边，而又害怕他中途变心的复杂心理，显得缠绵悱恻，情意真挚。其中特别是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四句，用浅近自然的语言倾吐至情，尤见出色，自刘宋以后模拟者代不乏人，“自君之出矣”也便成了专写闺情的一个诗题。

刘桢（公元一七五？—二一七）字公干，东平宁阳（在今山东宁阳县南）人，父梁以文才著称于世，为汉宗室子孙。刘桢于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入许，后曾随军北征袁绍，又参与赤壁之役。建安十六年，由丞相掾属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以其聪敏多才而深得曹氏兄弟赏爱。他性格傲岸倔强，因在宴席上平视甄夫人激怒了曹操，以不敬被刑，刑满复职，终为临菑侯庶子。

刘桢的五言诗向负盛誉，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锺嵘诗品把刘桢列在上品，称他的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又说“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可见在当时评价很高。从刘桢现存的十几首五言诗来看，其取材的广度及语言的丰富性比不上曹植和

王粲,但也仍有他的特色。赠从弟三首采用比兴手法,借物喻人。诗中通过对苹藻、松柏、凤凰的描写,表现诗人对于身处贫苦而心怀大志、不畏外界压力而傲然挺立的美好品质的追求,确有如锺嵘所说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气概。后世左思、鲍照等那些表现睥睨世俗、孤高不群的诗都从这里汲取过营养。刘楨的诗还善于描景状物。如公宴诗写月下的园林、泉流、花鸟、凉风,鲜明细腻,给人以清新秀丽之感。赠徐干一诗,大约作于“不敬被刑”之际,主要抒发内心的苦闷,其中“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翩翩”,把自然界写得生机盎然,有力地衬托出他当时失意落寞的心境,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他如斗鸡诗,刻画斗鸡的姿态情状也生动逼真,与应场的同题诗相比自要高出一筹。在散文方面,他的笺记之作曾被刘勰称为“丽而规益”,说是“有美于为诗矣”(《文心雕龙书记篇)。谏曹植书、答曹丕借廓落带书等,文字简约优美,往往通过精巧的比喻来点破事理,深刻而又形象,颇能发人深思,大概就是刘勰所指的作品。

应场(公元一七五?—一二一七)字德琰,汝南南顿(在今河南项城县西)人。祖父奉为司隶校尉,伯父劭官泰山太守,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早年因战乱曾漂泊他乡,归依曹操后,历任丞相掾、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等职。应场有二十多篇作品流传今世。别诗二首描写羁旅行役的悲苦,情意真切;弈势以历史上著名战役来比喻围棋的各种局势,虽有班固弈旨、马融围棋赋先例可循,但写来别出心裁,也可见出作者学识宏富。他其余作品大都平平无足可观。曹丕评论七子创作,于其他几家多所肯定,而独对应场只说“和而不壮”,别无赞词,看来他的作品不甚为当时所重。

七子中数王粲年辈最晚,而文学成就最高。王粲(公元一七七—一二一七)字仲宣,山阳高平(在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出身于豪

族官僚家庭。曾祖父龚、祖父畅都位至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后曾在朝廷执掌机密，又出任郡太守。王粲十四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深得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誉，称他“有异才”。初平三年，董卓馀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流寓荆州，依附同郡刘表，在荆州十六年，始终不受重用。建安十三年，归降曹操，任丞相掾，受爵关内侯。魏国建立后，以军谋祭酒拜侍中，曾参与制订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建安二十二年，随曹操东征孙权，道中病亡，时年四十一岁。

王粲擅长诗赋，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篇）。他早年处于社会大动乱的时期，面对现实，不时发出深沉慨叹：“天降丧乱，靡国不夷”（赠士孙文始），“悠悠世路，乱离多阻”（赠蔡子笃）。他对于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表示深切同情。如七哀诗第一首，为初离长安避乱荆州时所作，诗中先通过沿途所见所闻，生动深刻地描绘了大浩劫中的人间惨象，接着在篇末沉痛地唱出：“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悯时伤世、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纸上，读来觉得沉郁悲凉，感人至深。由于王粲长期遭遇离乱，又痛感胸怀大志而无所施展，所以他在荆州后期的作品常常流露出身世不遇、有家难归的苦闷，七哀诗第二首、登楼赋就是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代表作。尤其是登楼赋，抒写作者登上当阳麦城城楼四望时所引起的乡关之思、离乱之感，同时又表现了他渴望国家统一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愿望，见出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通篇结构完整，造语精炼而又明白晓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不愧为魏晋抒情小赋的杰作。归附曹操后，王粲的政治地位起了变化，他常与邺下文人诗赋唱和，写出了不少公宴、游览、述征、赠答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现实意义和艺术表现而言，比不上前期的深刻有力，但仍保持着前期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其中从军诗五首记述他跟随曹操出征的经历和心情,较有代表性。诗中热烈歌颂曹操的统一事业,表示“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愿为曹魏政权“输力竭忠贞”,流露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激昂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多半出于报答曹操的知遇之恩,但曹操所从事的统一事业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理所当然应加以充分的肯定,王粲的这种情绪也就无可非议了。总的来说,王粲的诗赋感情深厚,境界阔大,语言也清朗简净又富于文采,因而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抒写怀抱,往往显得才情横溢而文质兼俱,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说明了他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王粲的散文传世不多,却也自有其特色。其为刘表与袁尚书及为刘表谏袁谭书,从正反两方面陈述利害,劝袁氏兄弟息兵修好,共同对付曹操,写得有情有理,委婉恳切。有些文章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也颇有见地。如务本论,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奖勤罚惰; 爵论则主张应不失时机地论功赐爵,使“慕进者逐之不倦”。这些见解自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但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可供借鉴之处。王粲的散文骈散结合,简明流畅,在七子中可与孔融媲美。

如上所述,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成就不一,各有特色,但在创作风格上存在着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七子身处乱世,曾目击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各自也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现实的苦难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受;加上他们大多出身于儒宦世家,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抱负,不同程度表现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因此,他们的作品,不论是反映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还是抒写自己身世不遇的感慨,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莫不充溢着慷慨激昂之

情。刘勰在谈到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篇）“慷慨多气”也正是七子创作的共同风格，说明他们对建安文风的形成是作出了贡献的。

七子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通过他们的创作，促进了各体文学的发展。就诗歌而言，七子的成就主要在五言诗方面。五言诗起源于西汉，东汉时虽也产生了像古诗十九首这样比较成熟的作品，但这种新兴的诗歌样式不为当时文人所重，创作者甚少。到了建安时代，由于建安文人大量写作，才打破沉寂的局面，把五言诗推向繁荣。文心雕龙明诗篇在论述建安诗歌创作时曾经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哲之能，此其所同也。”由此可以见出，这时五言诗的蓬勃发展是与七子和曹氏兄弟等人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七子的五言诗，在古诗的基础上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又吸取了汉赋善于铺叙状物的特点，在反映现实、抒写怀抱及描摹景物上一般都能做到曲尽其意，质朴而不乏文采，表现出强烈而深厚的感情。五言诗在七子和三曹手中，已经完全成熟，此后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建安时代辞赋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以抒情咏物为主要内容的小赋，取代了两汉时期“铺采摘文”的大赋，占据了赋坛的主要地位。就七子现存的作品看，陈琳的大荒赋，宋人吴棫曾见过全文，称其“几三千言”（韵补书目），又刘桢的鲁都赋、徐干的齐都赋似模范班固、张衡的“两都”、“二京”，当均属于大赋，其余则几乎都是抒情小赋。这些抒情小赋或言志述怀，或纪行咏物，较之以往张

衡、蔡邕的同类作品，题材范围有所扩大，并且描写细致生动，文字清丽流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诗赋互为影响，二者除句式不同，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已无甚区别。这种诗赋合流的倾向，在七子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极大地提高了辞赋的艺术表现力，为后来六朝抒情小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至于七子的散文，都好用典隶事，句式多用排比对偶，已经明显骈化，他们在两汉散文向六朝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总之，建安七子同三曹等建安文人一起，对于建安文风的形成、各类文体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绩。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建安能者七，卓犖变风操。”对他们勇于变革的精神，以及在文学史上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应加以充分肯定的。

建安七子诸家诗文集，隋书经籍志皆有著录，大约到宋代便先后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明清人从唐宋类书、总集及史乘中撮钞而成的辑本。其中以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有曹植而无孔融）、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缺徐干），以及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等较有代表性。此外，明冯惟讷古诗纪和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分别辑存有七子的诗和文。以上各家为当时客观条件所限，不同程度存在着蒐罗未备、勘理欠精等缺失，但是，他们为保存七子的诗文，并使之广为流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现在的建安七子集，就是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参稽群书，搜采轶逸，辨伪订讹，重新整理而成的。

本书所收七子诗文，人各一卷，合为七卷。一卷之中，孔融无赋除外，按诗、赋、文分类编排，每类下的篇目则大体上依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编次。每篇诗文都一一注明出处，首列的出处即为

辑录底本,其余各书及冯惟讷古诗纪、张溥百三家集(简称“张辑本”)、严可均全后汉文(简称“严辑本”)则为校本。散见于诸书的佚文,凡确与底本上下文字相衔接者,则径为搭接,并用方括号标示,同时在校记中说明出处,无法搭接者则另立一条。在辑校时用作底本的有:

- 文选 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
- 玉台新咏 世界书局排印吴兆宜注本
- 文馆词林 适园丛书本
- 乐府诗集 中华书局校点本
- 章樵注古文苑 四部丛刊影宋本
- 玉烛宝典 丛书集成本
- 编珠 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北堂书钞 清光绪孔广陶校刊本
- 艺文类聚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 初学记 中华书局排印本
-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宋本
- 事类赋 明嘉靖无锡崇正书院刊本
- 海录碎事 明万历卓显卿刊本
- 韵补 清光绪渭南严式海校刊本
- 文镜秘府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 太平广记 中华书局排印本
- 太平寰宇记 清光绪金陵书局刊本
- 九家集注杜诗 中华书局影宋本
-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四部丛刊影宋本
- 后汉书 中华书局标点本
- 三国志 中华书局标点本